

中国实践 ——一场伟大的现代性革命^{*}

◎田 明

1867—2017 年，世界用了 150 年去理解《资本论》，终发现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客观贡献，在肯定资本主义创造力的同时，必要为其狭隘性付出代价已成不争的事实。1998 年，美国《金融周刊》坦言：“仅在十年内就实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向危机的转变”，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百年前的洞察力与危机意识。1840—2017 年，世界用了 177 年认识中国，中国也同样花了 177 年认识自己，期间外界的贬低超过了赞誉，自我的菲薄胜过了自信。而今，中国实践的伟大成就为世人惊叹，而其意义非言语可表。

不论马克思还是中国，两者的经历均与资本相关。马克思批判资本被视作西方文明的敌人；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又将中国视为政府的对象。《共产党宣言》曾精辟指出：资本主义“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任务项目“香港本土主义思潮研究”（17JD710046）阶段性成果。

话——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人类文明融入了资本的力量，就如同戴起了有色眼镜，在资本的天平上，落后即是不正当，受欺凌被看作理所当然。

然而，当一切不必然转化为“必然”，在一切不正当转化为“正当”后，资本主义文明内部却出现了裂痕，传统和现代不仅在理念上难以适合，就连在发展路径上也无法合拍。传统力量受到质疑的背后，是信仰根基的不确定性、人性的不确定性，除了资本，再无任何必然可以依靠。资本认同令人性关怀降到冰点，社会普遍失去了信任和认同，并引发关于文明境遇的反思。吉登斯讲道：“为什么现代性的激烈化会如此动荡不定，又如此意义重大。它的显著的特征——历史进化论的终结，历史目的论的隐没，对现代一以贯之的结构性反思的认识，以及西方特权地位的消亡——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全新而纷乱的情景之中。”^② 于是，在资本构建全球化体系的同时，各种文明都渴望能在资本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必然遭遇全球资本普遍性与民族特殊性发展的矛盾。谁能解决它，谁就可以在现代性世界中独立、发展、壮大、富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

②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一、制度实践：发展落实于人的价值实现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① 毫无疑问，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否认资本的存在，资本是全球化的血液，全球化是人类命运的必然趋势。但是，中国历来看得清楚，资本力量的普遍性与西方文明的特殊性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更不能把资本效应全部等同于西方文明的专利。马克思在《1857—1858 经济学手稿》中区分了资本逻辑与一般生产逻辑。资本生产不仅是一种物质性生产，更是精神性生产，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便是价值观。人类不是立足于自然需求选择资本生产，而是基于交往需要自觉走入资本体系之中。在价值标准从一元走向多元的趋势下，价值观的直接性交流必然碰壁，只有在交换价值认同的新基点上，间接实现价值认同。所以，资本是形式，文明是内容，两者如何实现具体历史的统一，是解决现代性社会认同问题的关键。

资本这一现象首先诞生于西方。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生产方式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不过，普遍性只有被赋予了历史内容才能转变为现实。现代人常把资本生产方式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便是犯了以内容替换形式的错误。马克思·韦伯认为：“清教的职业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禁欲主义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10 月版，第 14 页。

行为的重视，势必直接影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① 自1500年以后，西欧社会逐渐走向人类理性解放的道路，基督教的存在是解放的前提。西方文明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开启了专制与自由的解读。加之资本力量的率先应用，使西方文明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并依托资本之力全面传播，获得广泛认同。前提决定了资本发展的特殊性，也带来了问题的特殊性。一些西方中心论者从自身视角出发，检视一切人类发展现象，将其纳入到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中，用特殊代替普遍，继而又用普遍去佐证特殊。其实，韦伯思想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无根本冲突，前者是在诠释资本在西方文明中的特殊表现，而后者揭示了资本从诞生到发展的普遍规律。明确这一前提便可清楚地发现，资本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转化必须以文明为基础，不同文明也必然造就不同的道路。可宗教改革与理性解放的胜利使人们不愿意面对现实，更不想在其中加入反思。当一些民族所经历的封建专制被等同于西欧教会专制之后，当源于教会福利文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被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优势的时候，有的人不愿看到另一条道路的可能。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资本批判与资产阶级批判是区分对待的，资本带来了物化社会——即商品拜物教，资产阶级则带来了生产力的破坏——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前者依据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视角，讲求人之自由而全面发展；后者依据

^①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以精神》，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

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视角，讲求无产阶级解放。对于前者，马克思的解决思路是“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①。对于后者，马克思的解决思路是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②。所以，承认资本的存在是从历史总体发展出发明确当下所处的阶段，既然物化现象只能立足于社会共同体才能超越，那就需要遵循历史客观的扬弃规律，借资本之力超越资本；同时，承认资本不同于认同欧洲文明所造就的“资本主义”，其本质区别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西方的资本主义并不是资本的完美代言，自由主义更不是资本伦理的终极阐释。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破坏资本的力量，一旦资本力量被资产阶级掌控，文明必然会在经济危机中遭到破坏，如何正确应用资本之力才是正道。

中国制度与西方制度的本质差异在于，中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主张自觉运用资本之力，西方主张让资本自发运转。前者面向人之需求应用资本，后者面向资本需求放任自流。马克思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目的，就是让社会能够重掌资本之力，使人从资本统治的客体转变为自觉运用资本的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0 - 571页。

②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体，只有当物质生产“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①。中国经济腾飞的事实已经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中国制度的先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坚持劳动者掌握生产力，坚持以人为本推动文明进步。

二、信仰实践：人的科学发展

信仰危机是现代性问题的核心表征。在资本力量下，价值信仰处于弱势。马克思曾言：“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变成赤裸裸的谎言”^②，并用“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③来形容资本主义社会中既平等又野蛮的现实。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社会现象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是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当西方步入现代性社会后，传统宗教文化的根基被动摇，信仰领域出现虚无化倾向。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性拓展，各个民族又均遭遇到不同程度的信仰危机，主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失去信仰意味着社会丢掉了认同的根基，由此引发社会正义缺失等一系列问题。

早在19世纪，马克思便清晰地意识到重建信仰的必要性，“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案

①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①。通过分析信仰产生的机制，马克思发现，现代性信仰受到资本的冲击，根本原因不在资本而在信仰自身。表面上看，传统信仰所依托的神圣性元素被科技、资本证伪，可实质上却是因信仰自身所采用的形而上学教条化路线导致有限的价值观在落后于历史发展的前提下依然抱残守缺，激化了社会矛盾。一方面，信仰作为文明产物，相对于其所诞生的社会环境具有历史合理性。以宗教为例，如马克思所言：“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是只是它的现象。”^②信仰是历史特定时期内人自我认识的产物。然而，自我认识往往会在历史中发生延异并缔造精神传统，以精神之力禁锢历史前行的步伐。故而，信仰这一文明现象并没有错，问题出现在人自我认识的阶段性与发展总体性的矛盾上。

信仰根本上是对人自身的诠释，只有与人的存在本质相符，并采用科学的发展路线，才能使信仰之力获得正当运用，以实现社会正义、建构人与人之间的认同。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是什么”问题，而是实践意义上“如何表现”的问题。人在实践中获得诠释，又在实践中获得发展，最终通过实践复归于人。历史上出现的种种不充分信仰最终导致人被异化的结局，马克思指出：“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他们在幻想、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锁下日渐萎靡消沉，我们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① 可见，一旦不充分的理解占据统治地位，其中的弊端就会转化为“想象的专制”，使人的发展脱离人的轨迹。

现代性信仰危机便发轫于此。表面上看，价值多元化致使信仰根基缺失，实质上却是人对自身片面性理解教条化的结果，社会中的一系列不确定性在价值冲突中形成。人们总想复归统一性，却又不愿承认他者的合理性。资本主义的世界里，“一切似乎都不安全，或是没有价值：变革的速度飞快，世界新的能力无穷，不断取代旧时的确定性以及对一个安全而符合道德的世界的认知”^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人真的丢掉信仰，所谓的发展、改变、价值冲突便失去了意义。面对这一局面，自由主义看似肯定个体价值，实则在放任冲突，以期借资本之力将一种片面价值观推向真理的位置，令其拥有统摄力。

而马克思则认为，人永远不会放弃自由且全面发展的理想，它作为一种精神统一性贯穿于整个历史，并在不同阶段上表现为特殊的文明传统。作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生产力能够突破狭隘的传统的统治，使人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扬弃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9页。

② [英] 玛丽·伊万丝：《现代社会的形成》，向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75页。

我认识、完善自我认识。共产主义是一切实践的最终根据，又通过实践使其内容不断充实，“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①。因此，共产主义信仰并不是一种形之上的教条，而是对从改变世界走向改变人自身这一过程正当性的信念，最终落实在人之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际中。历史发展从来都是始于人、为了人、发展人，最终复归于人。这一过程既要面对阶段性，更要面对规律性与总体性。

中国实践虽然有过波折，但由于遵循了科学的信仰体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披荆斩棘，取得伟大成就。中国虽然也面临价值多元化的挑战，正因为坚持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才能在各种不确定性中找到价值统一性的根基，更能在发展阶段性上看到信仰实现的必然。

有的西方学者自豪地认为中国成功是因为使用了西方思想，这样的误判在于混淆了问题与道路。的确，全球化进程使不同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例如如何实现国家的法治、民主、自由，如何立足于经济发展改善国计民生，然而法治、民主、自由、发展不可能是西方文明的专利。作为近代被西方文明掠夺的对象之一，中国立足于自身探索实现了由弱变富，由富变强。可一些与中国具有同样遭遇的民族，却因奉西方道路为圭臬还在独立自主的进程中挣扎。西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5页。

方设立的“真相与谅解委员会”并没有将中国作为曾经迫害的对象列入其中，可那些位列其中、受资本原始积累迫害的国家民族却在所谓“谅解共识”中陷入迷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独立自主，走向文明富强的道路，对于那些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来讲不失为一种参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正视资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学会合理运用资本去发展人，结合民族特色实现人的价值，这是中国自主探索的成果，为全球化作出了自身的贡献，更开辟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合理道路。未来我们依然会面临新挑战、新问题，但只要实时明确人的本质与现实，就必然能够找到正当的发展路线。中国道路立足于本国实际，放眼世界文明，坚守民族性，融合世界性，这是中国智慧，更是中国贡献。

（作者系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